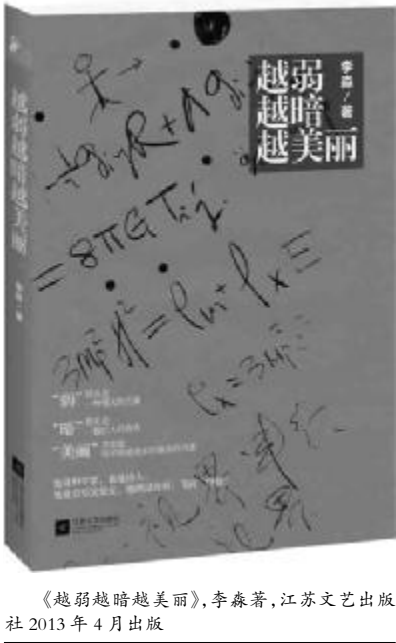


《越弱越暗越美丽》从生活的最细微处着手,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述物质世界中简洁又美丽的法则,用科学来解释生活的可能性和多元化,既严谨又八卦,高深却也不失亲民范儿。

科学也可以这样“八卦”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越弱越暗越美丽》，李淼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4 月出版

阅读分享

李洱： “背着土地行走”的《生命册》

■周天

反映时代变迁、挖掘人性深度、探索全新的文学模式，是当代著名作家李佩甫新作《生命册》的价值所在。

说起李佩甫，同为河南老乡的作家李洱对其创作知之颇多。他向笔者介绍说：“李佩甫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他一直在写平原，他的平原就是他的中原，就是他的中国。三部曲中，影响最大的是《羊的门》，但我猜想，他最放不下的，写得最动感情的，可能是他的第三部《生命册》。”

确实，对李佩甫而言，潜心五年倾力打造的《生命册》俨然是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作品。多年来，他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生命册》中，他用大约一半的篇幅，描写了以普通的中原村庄无梁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自上世纪 50 年代大集体、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发展变迁，全面描述了乡土中国几十年来的变化。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我国 50 年来社会发展的素描。

“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

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早在十二岁之前，我已读完了三千张脸，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这是《生命册》里的开头。

把人当植物写，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色。“李佩甫在这部作品里进行了全新的文学探索，采用了一种树状结构的写法，把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而在其背后的一个生命，成为这个人的背景，或者说其成长的土壤。”李洱分析道，“他一直把人当成植物来研究，写人与土地、人与官场文化、商业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写植物是如何生成的，如何变异的，如何从一粒饱满的种籽变成一株歪歪扭扭的树，变成一片树林。”

这粒来自中原乡村的种子，经历了近 50 年的社会变迁，却难以摆脱中原土壤的泥土气息，因为其背负着“五千七百年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他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有时候，能把死人说话，也能把活人说死的），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作者用不断闪回的方式，在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切换，并以此为背景，串联起了“骆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中原这块“土壤”，长出来的各种“植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无尽的苦难的挤压下挣扎着。

“小说不是写了一个人，而是写了一群人，是一组群像，是无数的人，是无穷的远方。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梦想和失败，至今还在每个人身上重演。”李洱说，“毫无疑问，这是最近几年中国长篇小说的非常重要的收获。”

“背着土地行走”，《生命册》中的这句话堪称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对于转型背景下的乡村变化，李洱并不陌生，他直言：“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给传统的中国乡村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乡村。但现在，这个根基已经被连根拔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当然知道这种变化有其好的一面，人们比以前自由了，能吃饱了，甚至都已经需要减肥了，但我还是忧心忡忡。中国特殊的资源和人口状况，决定了乡村不能够走城市化的道路。乡村的城市化，总有一天会给乡村带来灭顶之灾。”

繁荣科普出版要有源头活水

■徐世新

创作理念落后，创作人才匮乏。目前我国的科普创作者素养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科普创作的理念还比较落后。大多数科普作品更多地着眼于传播科学知识，而涉及科学精神、科技价值观、科研道德、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太少。很多科普图书就是科学知识的简单堆砌和罗列，缺乏与文学性、艺术性的结合。另一方面是科普创作人员极度缺乏。2011 年我国专职从事科普创作的人员比 2010 年仅增加 210 人，共计 11191 人，只占科普人员总数的 0.58%。国内专职于科普写作的人大多是凭借着奉献社会的良知和对科普创作的兴趣在筚路蓝缕中艰苦耕耘。而兼职从事科普创作的人中文理兼通、文笔生动的则如凤毛麟角。

尽管科普出版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依然很多，但随着国家科学普及和文化发展的逐渐深入，科普出版领域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中国的科普出版总体上呈现出向上的良好态势，繁荣科普出版需要相关各方的同心协力。

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监管。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出版管理机构要加强引导，充分发挥引导社会和市场的积极作用。如对在科普出版上有突出贡献的出版社编审人员、科普作家给予重奖；对原创的重大科普出版项目加大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将科技工作者科普创作的成果纳入职称、职务考评体系之中等。这些措施将会引导社会各界进入科普出版，鼓励

优秀科普图书的出版，进而带动科普出版走向繁荣。近些年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以及“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等奖项的评选都加大了科普图书的评奖比例，这对于鼓励具有原创性、创新性的优秀科普图书的出版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科普图书的出版质量方面，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依据出版物质量监测的管理规定，定期进行抽检，发现问题就按规定处罚，使粗制滥造甚至是伪科学的“科普图书”不能进入流通环节。

其次，出版社要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管，对作者和选题进行严格把关，同时注重对专业科普编辑的培养。

目前全国有超过 200 家出版社经常性从事科普出版。之所以会出现 40 多名在校研究生化身“林静”出版上百本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探究式科普丛书”的事例，主要原因就是出版社对作者和选题的把关不严和重视不足。作为图书质量的负责方，出版社应该建立科普作者资质审查的机制，通过专业的培训培养科普创作的新生力量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创作，从而提升科普出版的质量和整体水平。

同时，出版社要把对专业科普出版编辑的培养提高到决定出版社生存和发展的高度。科普出版对编辑知识结构和选题意识的要求相对较高。优秀的科普出版编辑在选题策划、形式设计以及书籍质量提升等方面可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出

等相对高级的错误。然后我就想到，有关原子钟的种种还是写一下吧。”这就是李淼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我写文章没有什么确定的模式，一般都非常随性。”李淼这样跟记者形容他的写作，纵使这样，读过《越弱越暗越美丽》后，读者还是能发现书中李淼写的多数是他身边的事儿。

分享我的科研

在书中“新知客”部分，收录了李淼所写的诸如《三维：一个幻象世界》、《第三枚苹果》等多篇有关其科研领域新进展的高级科普文章。

“写这些是希望读者更了解您的专业吗？”记者不禁问道。

“我从来没有一个教化的心态，我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这方面的兴趣，觉得它有趣、好玩，值得同读者分享。”李淼回答。

曾留学海外的他，在热衷于跟大家分享自己研究领域的趣事这点上似乎跟西方许多科学家类似，在他看来，在很多时候，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所以，量子、宇宙、黑洞、弦论……这些让一般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生畏的词汇，在李淼的笔下，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走下神坛。

“弱是指万有引力，因为它可是各种相互作用里最弱的一种，但当它积少成多却很强，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暗是指暗能量，它虽然暗，但占得比重却很大，是一种巨大的存在。”

这是李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透露的书名“越弱越暗越美丽”背后所蕴藏的哲理。

不管是宇宙还是人心，牛顿还是王朔，热巧克力还是命运，书中的道理尽在于此——越弱越暗越美丽。



李洱 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获得首届 21 世纪鼎钧双文学奖，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类奖等，作品被译成德、意、法、英等多种文字。

版社要通过定期的各种培训培养科普编辑的主动创新意识，鼓励他们研究市场需求、追踪学术前沿，帮助他们去探索和体会书稿中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

再次，建立一支涉猎科学和人文领域的科普创作队伍是繁荣科普出版非常重要的环节。

现代科普出版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一支广泛而优秀的科普创作队伍是维系和繁荣科普出版的“源头活水”。目前从事科普创作的人员组成日益广泛，不仅有专业科普作家，还有科研人员、媒体工作者以及像“科学松鼠会”这样的民间科普志愿者。

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向公众传播科技知识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2006 年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师生积极响应徐光宪院士“进行原创科普创作”的号召，使得《分子共和国》一经出版，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连续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2010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2010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和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以及科技部评选的“2011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等各种奖项。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随着国家在科普出版方面继续加强引导、监管，出版单位严格自律、把关，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不断加入到科普创作的队伍中来，这些“源头活水”的不断汇集、沁润，中国的科普出版就一定会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

书里书外



『DNA 博士』的个人叙事

■尹伟红

评判杰出科学家的伟大程度，或给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伟人排座次，是一种十分有趣却又极难达成共识的消遣。然而，如果要问，谁能入列世界上最最幸运或最最幸福的科学大家，我则可以毫不犹豫地报出一个人选：詹姆斯·沃森。

上个月，这位有着“DNA 博士”美誉的传奇人物，在度过自己 85 岁生日之时，又迎来了他作为主角参与其中的那个划时代发现 60 周年纪念日。他有理由为之骄傲：25 岁时蜚声世界，34 岁时荣膺诺贝尔奖，40 岁时推出畅销全球、经久不衰的自传——《双螺旋：发现 DNA 结构的个人经历》。甚至，年过七旬之后，他依然还能站在科学巅峰，领衔人类基因组计划。

不止于此。照我看，沃森仍有几项“桂冠”可戴：最“花”，最“懒”，（一度）最年轻的名著科学家；而助他赢得更大声名的《双螺旋》一书，无疑还是最富争议也最具个性色彩的科学大家自传。

这本“牛人”自传的问世，虽然距那个“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有 15 年之隔，但却是早早就有所谋划的。用沃森自己的话说，写自传的主要理由，“是为了避免后来的传记作家把你基本的生活事实写错了。”而且，在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如何发现 DNA 结构的故事中，“有许多叫人意想不到的曲折曲折，应该让公众知道，此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但是，在 1962 年春天纽约城的一次晚宴之前，怎么写这个故事，我还没有成形的想法”。

灵感，就在那次晚宴结束后的演讲中冒出。当时，沃森讲了关于他们那个发现的“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故事”。“他们没想到我那么直率而公正，惹得他们一阵阵大笑，也听众们感觉到自己身在科学的那些伟大的瞬间之中……回家的时候，我心里美滋滋的。我明白将来我可以写作……”

此后不久，在一个十分休闲并有美丽的女助手相伴的环境中，沃森没怎么费劲就写出了 DNA 故事的头几页，而且炮制出了那个特别吸引眼球的著名开头：“我从来没有看见弗朗西斯·克里克谦虚过。”

接下来的几年间，沃森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他的书，并且想好了一个别有意味的书名——《诚实的吉姆》，旨在回击威尔金斯的一个合作者威利·西子的挖苦之语（他把沃森称作“诚实的吉姆”）。沃森决意“要直面西子提出的这个连累带刺、具有争议的问题，要说清楚弗朗西斯和我在构想 DNA 结构的过程中，是否不合当地地使用了国王学院的保密数据。”

沃森心里有数，照他那么个率性、不羁的写法，他的书出来以后一定会让好些人不痛快，也有可能会引发事端。因此，在成书过程中，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跟同事和朋友们频繁地交换意见。此时，已有阅过部分手稿的出版界人士告诫他，这本用第一人称来描述的书言语、措辞太过尖刻，有可能会触犯好些人，并惹上诽谤官司。这不，化学界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莱纳斯·鲍林读过手稿后，就怒气冲冲地写来一封信，要求删除诸如“莱纳斯的神经病化学”以及“莱纳斯看起来像头蠢驴”之类的词句。

起初，口无遮拦的沃森还不大愿意舍弃这些外人读起来痛快、可让当事人甚感窝心的言语，后来，他多少还是作了一些妥协。但书中对与其有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女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个人品性和学术水准的负面描述仍存留不少，从而给该书“预设”了日后最为人诟病的靶子。

实际上，当时最令沃森懊恼的是，就连他的“黄金搭档”克里克也认为，他的书“不是一本好历史”；“一些断言缺乏根据……把科学史搞成了嚼舌头”；“哗众取宠，难以自圆”；“……趣味也恶劣”。随后，更大的打击到来：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表态，不能出沃森的这本书。哈佛大学校长甚至亲自写信给出版社说：“哈佛不想介入科学家们之间的争斗。”

好在另外一些人并不这么看。1968 年 2 月，阿森组出版社将书名更改为《双螺旋》之后出版，并且很快就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人们评价它以一种自然、清新和张扬的写作风格，描绘了一幅逼真的科学画卷。这当中，雄心、竞争和心计展露无遗，同时也彰显了沃森和克里克这两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如何异想天开地“站在巨人的脚跟上”，于“竞赛”中击败那些功底深厚、学识渊博的大方之家，从而抢得头筹、大获成功的关键要素。

也许，如今仍不断重印的《双螺旋》，已然或正在成就沃森在那个发现之外的另外一项伟业。